导言　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

一、技术理性批判思潮的兴起

理性，一直是文明社会发展、进步引以自豪的精神支柱。但是，近代经笛卡尔、培根建立起的理性主义哲学（又称科学主义）主张理性思维至上、科学知识万能、逻辑方法绝对无误，把五彩缤纷的世界变成概念编织起来的单调世界。然而理性主义并没有只把美丽的鲜花和幸福的果实带给人们，危机四伏、扭曲人性的近代工业技术文明，使得人们对理性产生了怀疑。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在西方哲学中，形成了一股反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思潮。叔本华第一次大胆说出人的欲望、痛苦构成人的本质；尼采宣称酒神精神、人的本能冲动是人性最深刻的表露；柏格森强调“生命之流”，指出直觉是通向实在之路；弗洛伊德揭示“无意识”是人最真实的内心世界。他们否认理性与科学具有认识实在、把握世界的绝对权威，他们呼唤失去的人性、自我，把人从抽象的思辨的“理性王国”拉回到现实人间。

20 世纪以来，理性主义借科学技术之手开始指点江山，文明社会的技术化特征更加暴露出来，技术理性带来的“病态社会”、“单面人”、核武器扩散及全球生态危机，激起了西方学者的激烈批判。以人文主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成为西方哲学中的一股强大的潮流。斯宾格勒把文化与文明对立起来，认为文明是文化的终结，也即末日的来临[1]。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本质进行追问，发现人、自然连同上帝都已经被一种“展现着”的技术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系所笼罩、所遮蔽，“技术在本质上是人靠自身力量所控制不了的东西”[2]。马尔库塞、哈贝马斯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现代资本主义“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的现实，揭示了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性，技术的合理性转化为统治的合理性，其结果必然是“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扩大的奴役”[3]，“技术统治论”盛行。技术自主论者埃吕尔指出，我们生活其中的技术社会是非人性化的社会，“它使得现代的人类不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甚至不能选择自己的手段”[4]。J·里夫金、T·D·霍华德认为，人类文明的进程，其实是一个不断衰亡的过程，现代工业社会巨大的能量消耗，给我们居住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能量转化的速度就越高，有效能量消耗的就越多，环境的混乱程度也就越大。“不论我们作出多大努力，世界总在堕落之中”[5]。罗马俱乐部 A·佩西、D·米都斯等则对日益恶化的人类环境提出质疑，“这个世界系统的基本运行方式是人口和资本的指数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崩溃”，只有停止经济增长，才有望躲过文明劫难[6]。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更把反理性的观点推向极端，认为在“知识爆炸”的后工业社会，旧有的概念、规则不再有效，“一切的一切都是由支离破碎的片段组成的”。人们踏上了“不归之路”，多样性、非一致性、不完满性、不确定性、破碎性、否定性、反正统性已构成信息时代的本质特征和新的思维观念。主张用“游戏”的规则取代普遍的必然真理，用“流浪者的思维”横扫决定论的权威、拒斥整体的专制，他们把“摧毁”“冲突”“消解”看做是“一种生成”“一种创造”，而“不再渴望业已永远失落的家园”[7]。

西方这种对理性主义的否定、对科学技术的批判社会思潮，滋生出一种对文明社会未来发展的恐惧心理、无奈情怀，对未来的忧虑胜过希望，甚至对未来彻底绝望。它们从一个侧面被人们看做技术悲观主义，与理性至上、科技万能的技术乐观主义形成

鲜明对照，引起学术界和公众的强烈反响，人们对此褒贬不一。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意义

技术悲观主义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股重要的社会思潮，并且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1979 年和 1992 年，以技术悲观主义为议题，分别在美国和以色列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就以色列论坛的主题，编辑出版了《技术、悲观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文集，收录在美国 1994 年《科学社会学年鉴》里，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但是不可否认，长期以来学术界专论技术悲观主义的理论文章很少，专著则几乎没有。凡有涉及技术悲观主义这个词的，多是在研究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在评述某位学者的思想观点时，指出带有技术悲观主义的色彩，而缺乏系统研究。因为在我们谈论某种理论属于技术悲观主义，某位学者是技术悲观主义者时，我们甚至不清楚什么是技术悲观主义，对它的划界标准、产生背景、价值功能等更是模糊、混乱。目前学术界尚无人明确宣称自己是技术悲观主义者，不少学者如海德格尔、埃吕尔、法兰克福学派，以及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他们对技术的批判是深刻的，并对技术的恶果和无限制的发展表示担忧，但他们并不彻底反对技术。同样那些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学者像托夫勒、贝尔、维纳等亦对技术强权和引发的危机深表忧虑。

有关技术悲观主义的界定，有学者把它与反技术主义等同起来[8,9]；有学者称它为“超越论者”[10]；有学者称它为人文主义的技术批判[11]；也有学者把它与技术批判主义并列起来[12]；有的学者干脆对技术悲观主义的提法提出质疑，试图用人文主义的技术批判来涵盖对技术悲观主义的概括，用实证论或实证主义的技术认同来阐释技术悲观主义的对立面——技术乐观主义的观

点[13]。

那么是否存在技术悲观主义？技术悲观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它产生的背景和机制是什么？它有哪些表现形态及代表人物？它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和影响吗？我们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技术悲观主义？研究、梳理出这些理论疑惑，对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的内涵，更准确地把握文明进程的方向意义重大。

技术悲观主义，作为西方技术理性批判的一种社会思潮，在20世纪60—70年代随着技术向社会的全面渗透，危机和灾难随之膨胀，殃及全球，特别是1972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报告的发表，在全球引起强烈反响。然而技术悲观主义由于沾染一个“悲”字，它在修辞学上的消极、无奈含义，它对技术所持的怀疑、批判、恐惧和否定态度，使得学术界不做深入的研究而多以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待之。

笔者认为，这对那些带有技术悲观主义色彩的西方人文主义大师、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未来学家是不公平的。任何一种理论或思潮的出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未加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就对技术悲观主义断然全盘否定是不可取的。技术悲观主义同样有其合理的内核和有益的忠告，是不该轻易淡化和排除的[12]。这也暴露出我们在探讨这一问题上的传统心理和偏见，或者可以说，我们正处在理性主义统治之中，处在科学技术万能之中。这种倾向是危险的，西方现代化的种种弊端就是前车之鉴，我国现代化进程的种种困境预示着西方社会危机的再现。难道我们用二三代人的努力达到的目标，还要再用五六代人的代价去克服因达到这一目标而产生的恶果吗？研究技术悲观主义将有助于我们来审视自己的行为，把握人类的未来。

三、问题的提出及其探讨的价值

技术理性批判是近年来学术界探讨的一个热点，技术理性批判的结果常常引发一种技术悲观主义的心理倾向。但是由于人们对技术悲观主义存在较多异议，特别是我国学术界对其基本上都持一种否定态度。因而，技术理性批判作为规范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发展方向和模式的理论武器，常常被人们“漠然视之”。

无视技术理性批判的价值，对技术悲观主义采取一种简单的、甚至是武断的批判和否定态度，这是我们这个社会遭遇诸多问题和困境的根源之一。反思技术理性批判，澄清人们对技术悲观主义的模糊认识，对于未来文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选题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就本人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国内外尚无人对技术悲观主义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因此本书把技术悲观主义置于技术理性的背景下加以系统地研究，在理论上具有开创性。

（2）技术悲观主义的概念，虽然不断有学者使用，但含义模糊不清，造成了人们理解上的混乱。通过对技术悲观主义本质的揭示，弄清其内含和特征，亦有显著的理论意义。

（3）长期以来，人们对技术悲观主义的态度都是批判和否定，却很少有人考虑它的合理性方面。挖掘出技术悲观主义的价值合理性方面，就构成本书理论创新的又一方面。

（4）本选题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把技术悲观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结合起来考察我国现实社会发展问题是本书的一个特点。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两大国家战略，二者之间既表现相互促进的一面，也存在相互抑制的一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从其理论层面来看，两大战略则表现为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关系。本书对技术理性和人文理性内在关系的揭示，必将有助于中国在追赶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发展与环境并重、增长速度与生活质量同步的发展目标。

四、本书重点探讨的问题

1 系统考察技术悲观主义的发生过程。揭示从古至今，东方西方技术悲观主义的不同表现和特征，挖掘出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论著，肯定技术悲观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存在。

2 分析技术悲观主义产生的机制。本书将从文化的层面、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方面，以及技术的内在特性方面展开深入的研究，揭示技术悲观主义产生的必然性。

3.揭示技术悲观主义的实质。本书评析目前中外学术界关于技术悲观主义的几种解释及其片面性，力图建立把握技术悲观主义的方法原则，在此基础上，揭示技术悲观主义的实质，即它是根植于人的潜意识层面的忧患意识。

4.探讨技术悲观主义的价值合理性及对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启示。通过上述分析，确证技术悲观主义是有意义的，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它的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出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揭示它对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意义。

把可持续发展同技术悲观主义结合起来加以探讨，是本书的一个特点。在分析可持续发展理论产生的背景时，我们发现它与当代技术悲观主义的突出代表——罗马俱乐部的思想有着某种关联[14]。笔者认为，从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看，技术悲观主义与可持续发展理论都是人类危机意识的表现。所不同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超越了技术悲观主义对未来的消极心理和“乌托邦”

幻想。然而，可持续发展理论所追求的文明发展模式与现代工业发展模式是对立的，如何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面临着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双重挑战。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理论启示。

第一章　文明的历史印迹与现代转型

人类自诞生以来已走过 300 万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也不过 5000 年。这与已有 46 亿年历史的地球和 32 亿年历史的生命有机体来说，如同瞬间。人类的文明史虽然短暂，但其发展速度却不寻常，特别是 18 世纪因工业革命而辉煌的现代技术文明，其变化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它不仅建立了一个人化的物质世界，而且创造了一个心灵的理性空间。它们共同演绎着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一、文明的界说

文明，有人把它看做人类与大自然拼搏的历史，从远古拓荒时代到而今扑朔迷离的数字化时代，历史每前进一步，都伴着人类血汗的抛洒和智慧的创生。

文明，有人把它理解为劳动工具的进化，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到电脑时代，它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尺度。

有人认为文明是人类的福祉，有人认为文明是人类的恶魔；有人认为文明是一个上升的过程，有人认为文明是一个衰微的过程 。

文明究竟是什么，古往今来，人们对此奇异无穷。

（法国大拉罗斯百科全书）（1961 年版）认为：“ 文明是一个地区或一个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精神、艺术、道德和物质生活的总称。”

原东德《迈尔百科词典》（1971 年版）认为：文明是原始社

会之后的历史阶段，主要指与生产力提高密切相关的一种物质文化 。

西班牙《世界大百科全书》 (1978 年版)认为“ 文明就是居住在一定地区之内并为大家公认的合法当局所统治的人群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

中国《现代汉语词典》(1999 年版）认为，文明意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也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的文化的；还指有西方现代色彩的风俗、习惯、事物。

在西方最早使用“ 文明 ”一词的学者是英国 17 世纪启蒙思想家 T·霍布斯[15]。他认为，文明是人类从“ 自然状态 ”向“ 国家状态 ”的转变。

18 世纪法国学者伏尔泰认为，文明就是充分展现理性、自爱和情感这些神赐给人类的永恒人性。

19 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把文明定义为，一方面是指人类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指由此而来的人们对自然的影响的发展[16]。

19 世纪法国学者 F·基佐在（欧洲文明史）一书中认为，文明包含以下几层含义：①文明是社会发展（包括物质发展、制度发展）与精神发展（包括文化发展、科技发展）的总和；②文明是民族成长、发展的基础；③文明是所有社会组织形态的共性所在 。

1875 年日本学者福泽谕吉在（文明论概论）一书中把文明分为广义与狭义之别，狭义说来，文明就是增加人类物质需要的行为状态。广义地看，文明不只是满足衣食住行的享受，而且还在于追求高尚德智的境界。即文明是指人的身体安乐、道德高尚 。

德国学者 O·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文明是文化的完结，是一种发展了的人类文化所能达到的最表面和最人为的状态。

英国学者 A·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将文明视为最具逻辑历史分析范畴，并带有政治的、文化的，或者是宗教的色彩 。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学者 W·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崛起》一书中把文明视为生活方式相同的社会群体、一种自治的社会实体。行为规范主导着人类的社会活动，交通和通讯方式的变化影响着文明形态的变化。文明化就是文化的多样性、政治的多元性，以及市场体制的交换性和相互依存性。

日本学者岸根卓郎 1989 年在《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一书中认为，文明是指“ 语言和文字被逻辑化，被人们感觉和记忆，被积累和客观化，由特定的个人向其他人传递，向客观的知识体系发展，使人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达到丰富和舒适 ”。

1993 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认为，文明有两个含义，其一，文明是野蛮、落后、原始、兽性的对立面，指人类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形态、阶段或组织；其二，文明是一个民族、国家、地域或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群体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是人类最高的文化集团和最广泛的文化特点。

综上所述，人们对文明的解释各不相同，反映了文化的丰富内涵以及认识的多种多样，我们很难评判孰优孰劣。当代史学家 F·柯廷、F·克罗斯比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他们认为，各文明及其发展是与它们同早先社会的相互影响分不开的，或许可以把文明一词解释为拥有共同文化传统的社会，因为这个社会与早先的社会并无本质区别，只是规模与技术发展程度不同而已。首

先，不应将文明设定为具有明确边界的独立形态，而应把它视为在政治、文化及商业诸领域相互往来的彼此交迭的体系。其次，不应把古希腊罗马文明作为所有文明的样板。第三，应将文明作为对人类社会组成部分进行比较和分析的研究手段，而非具体的实体。最后，在分析某种文明时，对上层和大众文化应当纳入考虑之中[17]。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对人类历史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中就文明一词有着精辟的阐述，应该说为我们今天把握文明的实质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他们认为，文明是先进社会形态取代落后社会形态的一种动态过程；文明意味着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文化的昌盛。其基本点如下。

1. 文明是一种社会实践，人类劳动是文明存在的基础

恩格斯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18]。揭示了文明的两个基本特点，即实践性和社会性。

所谓实践就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而劳动是实践的基本形式，文明则是劳动的结果。正是劳动的进步，即劳动的方式、工具等的进步，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纺纱机等。它们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文明也是社会的品质，不能离开社会而存在。文明是社会的文明，单个人离开了社会，也就脱离了文明。“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应归入 18 世纪鲁宾逊故事的毫无世纪的缺乏想像力的虚构”[19]。其实，“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19]。

2. 文明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历史发展过程

文明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结果，具有四大特质：

其一是物质生产力，表现为文明的成果。主要指物质生产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发展水平和成就代表着文明的发达程度，而这种生产力的不断继承和发扬光大，就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的延续。并通过不断改变社会的形式保持这种文明果实的传递。马克思明确指出：“要不使文明的果实——已经获得的生产力遭到破坏，就必须粉碎生产力在其中产生的那些传统形式”。

其二是科学技术，表现为文明发展的杠杆。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生产力，看成是人类历史进步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20]。

其三是文学艺术，表现为文明的一种精神内涵。譬如文字、语言、作品、诗歌、雕塑等，尽管不同的文明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却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最深刻、最完美的体现。而不能把它们与旧的文明形式一同抛弃，都当作有害的东西，当作贵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

其四是哲学，表现为文明时代的一种活的灵魂。如果说人类思维是地球上最美的花朵，那么哲学则是人类思维之花中的最美的一朵。哲学已经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21]。

二、文明的成长及其特征

文明史就是人类的发展史，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不断生成着、变化着、发展着。

(一)文明的继承

文字的发明和广泛应用是人类文明史的起始标志。公元前3000年由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是人类迄今为止所考证的

最早的文字。此后，在北非、西亚、南亚、东亚、中南美等古文明，也相继产生不同类型的文字系统，它们大体可划分为表形、表音、表意三种类型，代表着文字发展的不同阶段。相对来说，表音文字更便于人们学习和应用[22]。

文字的发明使得文明得以继承和保存，文字的发明，极大地扩充了信息交流的时空范围，并且促进了人类思维的发展。凭借文字，语言所承载的内容才得以表述更精确、流传更久远；凭借文字，人类经验的承传、智慧的增殖，才有了便利的工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其名著《古代社会》一书中称，人类文明社会始于拼音字母的使用和文献记载的出现。

文明的发展就是已有的文化成果或文明积累有效地传给下一代，人类只有将自己置于前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有效的创新，从而推动文明的发展。通常，人们把文明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大类，物质文明指基于技术基础上的全部生产性成果，如城镇建筑、道路交通设施、生产器械、各类日用品等；精神文明指以思维方式为核心的行为规范、道德观念、文学艺术、法律、科学、哲学、宗教等。进行各种知识、经验、传统习俗的传授和训练是精神文明得以保存的关键。

(二)文明的表现形态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化群落都很注意文明保存，这关系到自身文明能否长期延续的问题。但没有哪一种文明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历史的印迹总是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文明的保存过程也是文明的“缺失”过程，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文明只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文明中的一部分。

谈起文明的存在形态，我们自然会联想起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历史学家根据时代的不同，常以古代文明、近代文明和现代文明来描述人类的文

明史。根据世界三大宗教的分立，也有人把文明划分为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和佛教文明。西方学者对此有着更进一步的划分。

19 世纪俄国学者丹尼列夫斯基在 1871 年出版的《俄国与欧洲》一书中把人类已经历的文明划分成 9 种文化历史类型，即：埃及类型、中国类型、印度类型、亚述－巴比伦－腓尼基类型、欧洲类型、希腊类型、罗马类型、阿拉伯半岛类型、日尔曼－罗曼类型。

斯宾格勒在 1918 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把人类已经历的文明概括成 8 种高级文化，即：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拜占庭阿拉伯文化、浮士德西欧文化、玛雅文化。

英国学者汤因比继承和拓展了丹尼列夫斯基和斯宾格勒的文明理论，在考察了人类近 6000 年的历史进程中，指出人类的文明已经出现了 26 个形态，其中有 21 个得到了发展。它们可归类于六大文明母体，即：古代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安第斯文明、古代中国文明、米诺斯文明、玛雅文明。其他文明均由这六大文明派生。米诺斯文明派生出：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拜占庭文明、古代希腊文明；古代埃及文明派生出：伊朗文明、阿拉伯文明；苏美尔文明派生出：古代叙利亚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派生出：墨西哥文明、尤卡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派生出：远东文明（可分为中国文明、朝鲜－日本文明）、印度文明；安第斯文明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另外有 5 个文明停滞不前，没有独立发展起来。它们是：波利尼西亚文明、爱斯基摩文明、游牧文明、斯巴达文明和奥斯曼文明。

麦克尼尔从世界史的角度把人类经历的各种文明归属四类，即：中东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它们构成了全球性的世界文明。

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岸根卓郎在各自的代表作《文明及其缺憾》（1930 年）、《爱欲与文明》（1952 年）、《文明论：文明兴衰的法则》（1989 年）中，把人类文明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

亨廷顿以现代文明为基准，认为当今世界在宏观上由七八种文明的相互作用而形成，它们是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

美国学者 A·托夫勒 1980 年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从经济形态的变化把文明分为农业文明（又称第一次浪潮），大约从公元前 8000 年开始，直到公元 1750 年；工业文明（又称第二次浪潮），从蒸汽机革命开始直到 20 世纪中叶；超工业文明（又称第三次浪潮），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转向，它将在 21 世纪上半叶形成。

19 世纪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把人类文明划分为亚西亚文明、古代文明、封建文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23]。

不论哪一种划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文明是一个生长着、延续着，以及不断被替代着的动态过程，各文明之间在相互冲突和碰撞中得以壮大或被吞并，表现出很强的民族性、区域性、宗教性、累进性和排他性。

（三）文明演进的方向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至今不过 5000 年，大体相当于人类全部历史的六百分之一。然而，这 5000 年来的变化，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 300 年的变化是巨大的、神速的，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断得到满足。因此用进步、上升、开化、合理、科学来描述文明的进程是顺理成章的。

摩尔根 1877 年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生存方

式不断进步的文明观。他根据对原始社会的系统研究，揭示了从古代社会到现代文明不断进化的历史阶段，它们是：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

恩格斯对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24]，“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 40 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24]。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一种相对更加进步的社会阶段，它意味着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文化的昌盛，它是与落后、野蛮相对立的，它是先进、开化、文雅的象征。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人类文明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盘旋上升的；在阶级社会中，文明的发展是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而非永恒。在此时代以前，人类文明尚未诞生，而在这个时代之后，人类将具有一个实现人人平等的全新文明，那就是共产主义文明。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学者 J·布洛诺夫斯基在《人之上升》一书中这样写到：“人类以其富于想像的天赋与其它动物区别开来。人类综合运用自己的种种才能，制定计划，从事发明与创新。当人类学会以更复杂、更精巧的方式综合运用这些不同才能时，人类的创造发明也就更复杂、更加精深了。因此，不同时代、不同文化形态在技术、科学和艺术领域的种种伟大发现，无一不表明人类才能的日益丰富和复杂的联系，表明人类智慧的常春藤的攀援上升”[25]。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未来学家 A·托夫勒及其夫人在 1995 年出版的《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一书中指出，21 世纪，人类即将跨入一个崭新的文明，这个崭新的文明就是以科技信息革命为驱

动力的“第三次浪潮”，它将是以知识为创造财富最核心要素的新文明，它将使历史的发展更加日新月异，大功告成[26]。此前，D·贝尔在 1973 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称其为“后工业文明”；Z·布热津斯基称其为“电子技术时代”；J·奈斯比特在 1982 年出版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中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冠以“信息经济”；英国学者福来斯特 1986 年在《高技术社会》一书中称为“高技术经济”；1996 年世界经济与合作组织在其年度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称之为“知识经济”。

其实，近代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者早就对人类文明的未来理想状态作过描绘。如 16—17 世纪英国的莫尔和他提出的“乌托邦”；意大利的康帕内拉和他提出的“太阳城”；德国的闵采尔和他提出的“千年王国”；18 世纪法国的梅尔和他提出的“教区公社联盟”；巴贝夫和他提出的“平等共和国”；19 世纪法国的圣西门和他提出的“实业制度”；傅立叶和他提出的“和谐社会”；英国的欧文和他提出的“劳动公社”等。

中国古代孔子的“礼乐社会”、老子的“小国寡民”、孟子的“仁政社会”、明代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太平天国的“均田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这些关于人类未来文明的天才幻想，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奠定了基础。

但是，人类文明社会的演进方向并不都是如上所述是进步的、上升的。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把文明的进程看做是一个倒退的、衰落的过程。

古代中国的老庄学派把文明进程看做是一个不断倒退的过程，庄子讲，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天下就大乱了。“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